

香港華人家庭健康

香港亞太研究所

馬麗莊 王家英 編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公共政策論壇報告

香港華人家庭健康

馬麗莊
王家英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編者簡介

馬麗莊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副教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報告輯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與社會工作學系家庭及小組實務研究中心於2007年1月25日合辦的香港華人家庭健康論壇。

© 馬麗莊、王家英 2007

ISBN 978-962-441-189-8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香港華人家庭健康

引言

(王家英)

這個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與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家庭及小組實務研究中心合辦，題目為「香港華人家庭健康」。大家也看到，社工界一些重要人物也抽空出席了。我們舉辦這個論壇，希望能推動有關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討論，故期望聽到在座各位的精彩意見。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兩大任務是：（一）推動公共政策的研究；（二）推動公共政策的討論，希望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更多地參考專家和民間的意見。至於家庭及小組實務研究中心，將在稍後時間由馬麗莊教授為大家介紹。在論壇正式開始前，我們首先請中大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少南教授致開幕詞。

開幕詞

(李少南)

中大社會科學院一向積極推動專業的跨學科研究，是次的研究小組便是一個好例子。家庭及小組實務研究中心這次聯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以一個不同的角度，就現今社會關注的議題，作出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積極參與社會關注的議題，並提出意見，亦是社會科學院向來的宗旨。近年，大家看到不少家庭慘劇發生，引起香港社會各階層的關注和迴響。作為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學者，我們亦希望透過研究，與其他相關專業學

者、政策制訂者和資深的行政管理人員對話，互相交流，互相促進。這次論壇反映了社會科學院的同事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不懈地發展有關的知識，推動社會進步，藉此回饋社會。

相信大家對於「家庭健康」一詞一點也不陌生，不過，對於香港市民的家庭功能、家庭關係，以及個人心理健康的關係，大家事實上卻認識不多。這裏我有一點感想，若回顧我們的中學教育，基本上很少會看到有關家庭議題的教育，我們是否應該要從教育層面想想，加強這一方面的認識。因為能入讀大學的同學真的很少，只有18%，即使進了大學，如果不是主修社會工作學系，亦沒有機會接觸這一方面的議題，故此我們也要想想，是否要在中學教育加強一些如心理健康及家庭認識的教育。

今天，我們很感謝社會福利署副署長馮伯欣先生、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女士、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羅致光教授和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林陳蘭德教授，在百忙中抽出寶貴時間參與是次論壇。相信他們的見解一定能令在座各位對於香港華人家庭健康這個議題有所啟發。

「香港家庭健康狀況調查2006」調查結果摘要

(馬麗莊)

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和家庭及小組實務研究中心一直以來的使命和目標都是希望推動本土化臨床社會工作，這方面的工作包括兩大範疇：以家庭為本的社會工作和以小組為本的介入方法。我們的中心一向得到系主任鄧廣良教授的支持，包括精神上和財政上的支持。最近我們中心喜獲郭氏家族的新地集團捐贈一千萬元，讓我們推廣促進家庭和個人健康的活動。詳細情形，我不多說了，如果大家對這方面的活動有興趣，可以看看我們有關的資料單張。現在正式進入今天的議題。

我們中心的同事坐在一起時，都會討論香港家庭健康的問題，特別有一次，我們和王家英談及，香港幾乎每天都發生

家庭慘劇，實際上，香港整體的家庭健康狀況究竟是怎樣的呢？鑒於社會的訴求，特區政府早已視強化家庭為一個主要的政策目標。在這些背景下，我們希望透過是次調查，瞭解香港的家庭健康狀況。我們這個調查小組包括王家英、盤淑嫻、劉玉琮和我，問卷內容都是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這次調查的目的，是希望瞭解香港華人家庭狀況，研究家庭資源和個人身心健康的相關性，看看這些相關是負面的還是正面的。當然，我們亦希望能由此瞭解家庭健康水平的高低，並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一套家庭健康基線的指標。

是次調查以電話形式進行，在2006年11月8至15日間成功訪問了1,010位受訪者，回應率是52.7%。我們在進行是次調查前，曾回顧了許多相關的文獻，研究甚麼是家庭健康。最後綜合了幾方面的意見，認為家庭健康是指一個家庭能發掘它的內在潛能，有能力面對家庭的轉變及危機。大家也知道，生老病死不只是個人問題，還需要整個家庭共同面對，故面對危機時，家庭需有足夠的抗逆能力去處理壓力，從而促進個人和家庭成員的成長，回饋社會。我們不希望把家庭健康分類，說哪些是健康家庭，哪些不是健康家庭，因為這只是另一種專業標籤。家庭健康是動態的，是會改變的，這些改變隨著家庭的生命周期而出現，以適應外在的社會文化處境，故此我要再三強調，家庭健康只是一種狀態。我們參考了有關文獻，尤其是澳洲方面的資料，把家庭健康這概念操作化為一般家庭功能。家庭功能彰顯於不同生活範疇，這包括：議決家庭事務、家人溝通、角色分工和表現、家人間的情感回應、家人間的情感參與和行為規範。而家庭功能能否發揮，則有賴家庭的資源，這些資源可以歸類為以下五個範疇：（一）時間運用，即和家人相聚和分享的時間；（二）經濟資本，特別是家庭的理財效能；（三）人力及文化資本，例如父母的學歷、父母教導小孩子的方法；（四）家庭處於逆境時的處理能力；（五）社會資本，這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人際關係，二是社區參與。

調查結果發現，¹很多家庭在面對危機時，家人都能互相扶持、信賴和接納，可見香港家庭的功能是不錯的；不過，當遇

到憂慮和傷心事時，不少受訪者都不會向家人傾訴，這顯示了中國人對家庭的忠誠和保護，凡事希望自己能解決，不想家人擔心。我們嘗試研究家庭功能與家庭結構的關係，透過單因方差分析（ANOVA）發現，二人家庭和核心家庭的家庭功能比獨居家庭高。在家庭收入與家庭功能的關係上，我們發現家庭收入愈高，家庭功能亦愈高。

在另一個家庭健康的指標——家庭相聚和分享的時間方面，我們詢問受訪者一家人過去一個月是否經常一起吃飯、閑話家常和進行一些閑暇活動。結果發現香港家庭的相處和分享情況不算太壞，一起吃飯的較多，但一起進行閑暇活動的便較少了。在家庭結構、家庭收入和與家人分享相聚狀況的關係上，獨居家庭和單親家庭在家庭相聚和分享時間上較大家庭和二人家庭為少，而家庭收入較低的家庭，家人相聚的時間亦及不上較高收入的家庭。

在理財效能方面，我們詢問受訪者有沒有入不敷支的情況，並以1到4分來評分，沒有為4分，經常為1分，結果平均分是3.47分，反映受訪家庭的理財效能並不太差。在家庭結構和理財效能的關係上，二人家庭的理財效能最高，單親家庭最低；同樣地，理財效能在高收入家庭是最高的，低收入的家庭便明顯低得多。

在人力及文化資本的問題上，因為資源所限，我們只集中探討管教小朋友的方法。我們以三條量度開明和導向式教導子女方法的問題來詢問那些有18歲以下小孩的家庭，發現那些家庭採用開明和導向式方法的平均數並不太低，為2.34（以0為最低，3為最高，數值愈高代表愈傾向以開明及導向式方法教導小孩）。如果拿這些數據和家庭結構比較，可以看到不同家庭結構在教導子女的方法上沒有明顯分別。但在家庭收入上，則以高收入家庭較傾向採取開明和導向式的方法。

我們又詢問受訪家庭過去一年有否遇到不如意的事，例如有沒有家人不和、失業、患病或去世等，以研究受訪者在應付這些事情時會否感到力不從心。在我們的樣本中，約兩成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曾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其中以家人不和為最

多，其次為家人生病、失業或遇到經濟困難。超過四成受訪者在遇到不如意事件時，會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而且他們應付生活能力的平均值也不高，為1.85（由0 = 經常感到力不從心至3 = 沒有感到力不從心）。在應付生活能力、家庭結構和家庭收入的關係上，研究顯示不同結構的家庭應付生活的能力沒有顯著差異。不過，家庭收入愈高，家庭成員應付生活的能力亦愈高。

在社會資本上，我們把它操作化成兩個範疇，首先是人際關係，這主要指受訪者和親戚朋友的關係、有否參加一些民間組織，以及跟鄰舍是否相熟等。我們發現約有八成受訪者跟鄰舍頗為熟悉，比我們的預期高。經常跟朋友交往的百分比亦頗高，但相對來說，投放於社區的社會資本則很少，很少參與民間組織活動，或甚至沒有參加的百分比也很高。這都顯示香港居民對社區沒有甚麼投入感，當然這亦可能因為社區設施不足，沒有甚麼可以投入的緣故。在家庭結構、家庭收入和人際關係的關係上，調查透露，家庭結構和人際關係沒有甚麼顯著的关系。但家庭收入便不一樣：收入愈高，人際關係的投放亦愈高；而家庭收入和人際關係的相關性也十分明顯，低收入家庭一般較少參與社區活動。

社會資本的另一個範疇為居住環境。我們詢問受訪者對家居內外的環境是否滿意，結果亦令我們十分意外，超過八成受訪者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我們在探討家庭結構、家庭收入和居住環境的關係時，發現家庭結構與居住環境的滿意程度沒有特別的關係，但家庭收入愈高，對居住環境的滿意程度亦愈高。如果把這兩個社會資本的範疇結合來看，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低收入家庭擁有較少的社會資本。

我們把不同的家庭健康心理指標以Pearson's correlation作分析，發現大多數的相關性都是統計上顯著，除「不如意事件」外，都是相輔相成的。例如愈高的理財效能，便有愈多的親朋和鄰舍聯繫等；相反地，理財效能跟「不如意事件」卻呈負相關，相關係數是-0.136。

我們亦要求受訪者評估個人的身體及心理健康，發覺他們

的自我評估並不太差，身體健康的自我評估平均分數是3.53，心理健康則是3.61（由1 = 非常差至5 = 非常好）。究竟個人的身體和心理健康跟家庭健康指數有沒有關係呢？如果有的話，關係又是怎樣呢？我們的分析發現，除了「不如意事件」外，家庭健康指標愈高，個人身心健康的評估就愈好；反之，因「不如意事件」帶來了心理壓力，故遇上「不如意事件」者的身心健康評估亦會較差。

我們把剛才那麼多的變項做了一些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精神健康與其他變項的相關性較身體健康的強，有關的 β 係數相對高。若從個人的社經背景變項看，男性的自我健康評估較女性高，但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則沒有差異。若我們細看家庭健康和身體健康的關係，依 β 係數的大小次序去看，第一是應付生活的能力，第二是社會資本中的環境影響，第三是人力及文化資本（中學、預科學歷），第四是社會資本中的人際關係。至於家庭健康與心理健康的關係，從 β 係數去看和剛才有些分別，依大小次序排列，首先是應付生活的能力，其次為社會資本、家人的相聚情況，以及人力及文化資本（中學、預科學歷）。

總括來說，很多香港家庭在面對危機時，家人都能互相扶持、信賴和接納。不過，若遇到憂慮或傷心的事情時，很多時候家庭成員都不容易跟家人分享。在個別家庭資源上，不論是跟家人相聚的時間、理財效能或家庭功能，單親家庭和獨居家庭都較其他家庭少或差。低收入家庭在不同家庭資源範疇上，都遠遠比高收入的家庭缺乏。此外，單親和獨居人士在面對逆境時，抗逆能力似乎亦較低。是次調查突顯了不同家庭資源運用的相輔相成，以及個人身體及精神健康的相互關係。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個人的健康，家庭健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範疇，兩者互相影響。從我們獲得的數據推論，如果家人之間能夠互相協調、包容、坦誠相對和扶持，在某程度上亦能提升每位成員的身體和精神健康。

根據上述的調查結果，我們建議政府政策應配合家庭健康

的發展需要，特別是當家庭面對逆境時，政府應盡量協助家庭有效運用社會資本和人力及文化資本，從而提升家庭整體健康和個人身心健康。因應單親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在各類家庭資源的短缺，各相關的社會系統，包括教育、醫療和福利等都要推行相應的輔助政策，把資源首先投放在這類家庭上。最後，我們建議政府有關部門或研究中心應就獨居人士的個人及家庭需要作進一步探討，以協助他們有效地參與社會，繼而增強家庭健康。

(方敏生)

首先，我很欣賞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和香港亞太研究所是次調查。香港的家庭研究很分散和不足，因此，我們給未來可能成立的家庭事務委員會的其中一項建議，就是在家庭研究上多花功夫。這個調查讓我們看到，有關的研究可以有兩個方向，其一為數據和理論架構，以理論架構分析數據的演變情況；其二為長線的發展歷程研究，以回應環境的改變。我在這裏呼籲大家多做有關的研究，因為我們對家庭的認知、認識和分析都很不足，希望將來能有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出現，在這一方面多做一點功夫，包括多鼓勵和資助這類研究。

我將在三方面回應這個調查報告：第一，我想討論一些不利於家庭健康的社會因素；第二，這次調查中所提及的所謂高危家庭，除了單親和低收入家庭外，還有沒有其他的類型呢？第三，我想討論家庭影響評估（Family Impact Assessment）制度，如果日後家庭事務委員會真的成立，推出以家庭為本的社會政策，便需要制訂家庭影響評估制度。

有關不利家庭健康的因素方面，我首先想說的是家庭工作和工作壓力的處理。是次研究可以讓我們看到時間是家庭一個很重要的資源，而長工時是影響家庭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全港現時有200萬個家庭住戶，其中有未成年家庭成員同住的家庭約有83萬，當中父母需要長時間工作，即每星期工作多於60小時的為數不少。2005年，有小朋友的家庭中約有20萬的家長需要長時間工作，而父母都同時需要長時間工作的，亦多達

19,000人。在單親家庭中，家長一人身兼父母角色，還要長時間工作的人數亦不少，約有七千多人，即平均每十個單親家庭裏就有一個。現時愈來愈多香港人需要跨境工作，那不只是長時間不在家，而是完全不在家！2005年時，要在國內工作的香港人接近23萬，2001年時，有18歲或以下子女的家庭而家長又需要在國內工作的，也有三萬多。

第二個不利家庭健康的因素是貧窮。根據扶貧委員會的最新數據，沒有工作的家庭住戶有186,500戶，這還未包括只有60歲或以上人士的家庭。家庭收入低於平均綜援水平的有258,900戶，這兩組數字互有重複，但生活在這些家庭的15歲或以下兒童的人數並不少。若家庭收入低於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我們便稱之為貧窮。依據這個標準，香港有子女家庭的貧窮率是20.4%，當中單親家庭的貧窮率高一倍，達41.7%，所以難怪剛才的中大調查說單親家庭是高危的。有些家庭雖有父母，但可能父或母其中一人坐牢，又或是失蹤了，長時間只有一名家長與子女同住，這些家庭的貧窮率也不低。除了單親家庭，新移民家庭的貧窮率都很高，差不多比平均高出一倍。單親且居港不足七年的家庭的貧窮率則更高。我想強調的還有兩點，第一是人口高齡化，家庭要照顧愈來愈多的體弱年老成員，帶來了新的問題和壓力，家庭有沒有足夠資源或適當方法處理呢？第二是人口流動的增加，包括要跨境工作，以及要送子女到外國讀書等。家庭成員生活圈子的擴大，對剛才提過的人力及文化資本帶來的衝擊亦大了，其實這也是一種壓力。

跟著，我想談談高危家庭。我很同意中大的調查所說的單親和低收入家庭是高危家庭的其中兩種，不過，需要照顧體弱或殘疾人士的家庭也不容忽視。2000年時，全港傷殘人士約有33至35萬，其中七萬人需要別人照顧日常起居生活，當中有些是住院的，沒有住院的也接近四萬人，這四萬人還未計算弱智人士在內。這類人士是否可以獨立生活？對家庭照顧的要求或壓力又是如何呢？我認為這些問題也可以提出來讓大家思考的。

我亦希望藉著這個場合提出一個建議，讓未來將會成立的家庭事務委員會考慮。現時香港有兩類評估，一是環境影響的評估，二是可持續發展的評估，所有的新政策都要經過這兩個評估制度，才能送去行政會議和立法會討論。環境影響評估的要求條件較高，因為受到立法規管，要公開交代情況。可持續發展的評估則會放到網上，任由市民參看。我建議可實行家庭影響評估，其他國家也有推行類似的做法，作用是落實特首說過的對家庭的重視，在考慮政府決策過程中提升家庭的位置。這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可幫助立法者和政策制訂者去評估各項政策措施對家庭的影響。這種評估制度是羅致光當議員時在立法會上提出的。所謂家庭影響評估，其實就是評估家庭健康。中大的調查奠下了一個基礎，讓我們探討何謂家庭健康。政府政策對家庭影響的可能範圍包括：第一，經濟狀況；第二，家庭的照顧功能；第三，家庭成員間的凝聚力；第四，政策對弱勢家庭的影響。如果將來真的成立家庭事務委員會的話，應該在這些範圍中再訂指標。一些公共政策如稅制、就業、房屋和社會福利對家庭功能有很大的影響。在稅務政策方面，現時單親人士和供養子女、父母、祖父母都有免稅額，但可否再增加一點呢？很多低學歷低技術的中年人被解僱後便找不到工作，那麼供養60歲以下的低收入或失業父母是否亦可以申請免稅額呢？現時社會愈來愈高齡化，是否需要給予照顧年老體弱者一些津貼？在就業政策上，我們應要營造一個「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訂定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彈性上班時間等政策。其他國家都有類似的經驗，可作參考。在房屋政策方面，政府要鼓勵兩代互相照顧。現在如果成年子女從內地來港照顧住在公屋的父母，並不能正式入戶，這種做法是否需要檢討？分配公屋的時候，政府應否先考慮擴大家庭互相照顧的需要？政府亦應推行以家庭為本的城市規劃。在社會福利政策上，政府須加強對單親家庭、需要照顧體弱或殘疾人士家庭的支援服務，鼓勵社區互助網絡，強化家庭的社區生活支援。如果將來能建立家庭影響評估機制，並能成立一個家庭事務委員會，便可使家庭政策更為連貫，令各項公共服務都能以家庭為本。

除了家庭影響評估機制外，如何建設一個「家庭友善」的社會環境也很重要。我們跟會員機構已討論過許多次，認為以家庭為本並不單是政府的政策，整個社會都應該要重視。如何令社會不同的階層參與、支持一個「家庭友善」的社會呢？這是未來的家庭事務委員會要慎重處理的問題。要建立「家庭友善」的社會環境，必須平衡工作與家庭，並且在社區設施、支援服務和公眾教育上想辦法。

（馮伯欣）

首先要感謝中大做了這個香港華人家庭健康狀況的調查，我也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對於這個調查，我只想說，很高興知道原來香港家庭和諧指數也有一個不錯的水平，但是我們亦注意到，家庭在面對危機的時候，家庭成員都不容易表達個人感受及擔憂，而且單親、獨居和低收入的家庭的資源相對較少，這些都是我們提供服務時要比較留意的高危一族。

我想大會邀請我，主要想我從政府角度解釋政府政策和服務方面可以如何配合，以提高香港家庭的健康指數。這問題可以從很多方面去看，如從社會福利服務、家庭服務、親子關係或就業能力的提升等角度來分析，由於我來自社會福利署，所以想集中討論家庭服務。

首先和大家作點政策回顧。2006年10月的施政報告有一章提及家庭，當中特別強調重視家庭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念，和睦家庭就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剛才方敏生亦提過，政府正以半年時間研究是否成立一個家庭事務委員會。至於社署家庭服務的整體目標，相信大家也十分瞭解，包括維繫和加強家庭的凝聚力，促使家庭和睦，協助個人和家庭應付和預防問題，以及為未能自行應付問題的家庭提供協助。

香港家庭正面對多項挑戰，首先是人口老化。在2005年，香港約有80多萬65歲以上的老人，當中約有十萬獨居或兩老同住，預計到了2033年，老人人口將佔整體人口的26.8%，平均約四個人就有一個是老人，故老人照顧問題將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大挑戰。第二是離婚數字的上升。自1981年開始，結婚人

數不斷下降，到了2005年才有回升；而離婚數字就一直上升，到了2005年，差不多每三對夫婦就有一對離婚。如果離婚時處理不當，便會產生很多問題，如小朋友撫養權的爭拗，嚴重的話可能會引發家庭暴力事件。第三是單親家庭增多。中大的調查也指出，單親家庭是我們較需要注意的一群。單親家庭的數字正不斷上升，這亦和離婚率的增長有關。2005年時有單親家庭76,000多個，而單親家庭領取綜援的也較多，在2005至2006年度就有三萬多宗。不過，近一兩年領綜援的單親家庭出現平穩或稍微下降的趨勢。第四是再婚家庭數字的上升。若以2000年和2005年相比，再婚家庭由6,691個上升至15,042個。這產生了很多家庭成員的適應問題。第五是新來港人士問題。現在每天有150個持單程通行證新來港人士，一年便有五萬多人，以婦女較多，她們都面對不少的適應問題。第六是家庭暴力的問題。虐待配偶的數字這幾年有上升的趨勢，每年約有三千多宗，而虐待兒童個案亦有600至700宗。這固然由於社會較以往複雜，但我們亦看到，因為近年大家較為關注這些事件，故求助和轉介個案也多了。

在服務策略上，社署採用三管齊下的方法，包括預防工作、家庭支援及一些專門服務，以應付剛才提及的各種挑戰。在預防的工作方面，這幾年我們十分重視家庭凝聚，希望盡量減少暴力事件，故推行了一個大型公眾教育運動，名為「凝聚家庭，齊抗暴力」，採用了不同方法來傳達有關信息，包括壁畫創作、不同的宣傳品如檯墊、書籤、日曆、海報、巴士車身宣傳、街板、宣傳聲帶、宣傳短片等。2005年的施政報告特別提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故此在2005年後，政府亦增加了資源，通過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其他政策局、部門和香港電台，推行「加深家心行動」，製作宣傳片、宣傳聲帶、電台及電視節目，舉辦一些地區活動及親子教育的巡迴展覽。這個運動要推廣的信息包括四點，一是身教，二是和諧，三是關懷，四是承擔。有關活動仍在進行中。

此外，政府的預防工作還包括強化社會資本，積極推動

政府、商界和一些民間組織一起合作建立社會資本，提倡企業的公民責任，以社區承托家庭來幫助各種弱勢社群。有些事情是家庭本身未必能夠自行解決的，若鄰舍也能扶上一把，如幫忙照顧幼兒和老人，或許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在強化社會資本方面，有兩個基金可以一提，一個是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在2002年推出，預備了三億作為開支；另一個是兩億元的攜手扶弱基金，於2006年推出。各個民間組織和團體，若有一些新意念，可以向這些基金申請資助，目前已經推行的計劃有百多個。如由東華三院和MaBelle合辦的「樂在潔耆居」計劃，便是得到攜手扶弱基金的資助。這個計劃在沙田區組織了一群婦女，約有160人，去幫助區內約250戶的獨居長者做一些清潔家居的工作。這有多重意義：第一，參與的婦女可以透過這個計劃找到工作，增加收入；第二，通過這群婦女建立社區網絡，幫助區內老人改善家居環境，亦可藉著探訪老人家庭增強對長者的關懷。這些計劃的確可以提升家庭的社區資本，值得鼓勵。有關團體如果有新建議，也可以再向這些基金申請資助，推行新計劃。

在支援工作方面，政府設立了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以往這些中心只負責一些個案工作，但在2004年後，服務轉向綜合化，中心設施也逐步轉型。以往的服務中心只負責個案，間格都以寫字樓、面見室為主，但現在這些中心都有社區中心的格局，有上網的地方和「資源角」，讓市民尋找有關資訊；有遊戲室，讓婦女參加活動時把小朋友安置在那裏玩耍；有家庭照顧室，讓婦女學習如何照顧小朋友和處理家務。服務中心除提供個案輔導外，服務亦較多元化，包括親子活動、家庭生活教育、諮詢、義工、外展服務等。辦公時間也不像以往般朝九晚五，一些晚間時段和星期六下午也開放，方便更多家庭參與活動。全港現時共有61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絕大多數都會向我們剛談到的高危家庭提供服務。在服務中心正處理的四萬多個個案中，單親家庭佔了六千多宗，約15%，經濟有問題個案約佔13.6%；另外，獨居長者個案及新來港人士個案，亦分別佔3.1%和3.4%。除了個案輔導外，服務中心亦組織支援小組。在

2005至2006年度，我們一共成立了2,900多個小組，其中十分之一左右專為單親家庭而設，260個專為新來港人士而設，以幫助他們適應新生活為目的。當然，單親家庭或新來港人士也可以參加其他小組，與其他非單親或非新來港人士的家庭溝通交往。

在幼兒服務方面，政府提供幼兒的日間照顧和住宿。這些服務分為很多種類，我不詳述，值得一提的是這幾年成立的互動幼兒中心。互動幼兒中心的職員不多，只有一、兩人，或是一些兼職。中心讓這些婦女自行組織起來，給她們一個可以輪流照顧兒童的地方。來年我們希望和這些中心商議，看看可以怎樣提升這種服務。

在支援青少年的服務方面，政府在2005至2006年度推出了「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針對貧窮或雙失青年的需要，提供教育或職業技能的培訓，為他們帶來更多的生活體驗。其次是專門幫助單親家長的「欣曉計劃」。正如剛才所說，單親家庭拿綜援的有上升趨勢，若他們長期拿綜援，我擔心他們會和社會脫節；況且將來當這些家庭的小朋友長大後，單親家長若要重新出外找工作，亦會遇上很大的適應問題。領取綜援而最年幼子女年齡介乎12至14歲的單親家長便可參加這個計劃，目的是協助他們尋找每月工作不少於32小時的職位。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劃，協助他們盡早融入社會，邁向自力更生。在2006年4至11月這七個月期間，有六千多人參加了這個計劃，其中1,200多人成功找到工作。

此外，我們還推行了「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主要針對一些初生嬰兒或六歲以下兒童，以母嬰健康院作為平台，加強各部門的協作。因為我們發覺九成的媽媽即使甚麼地方都不去，也會到母嬰健康院進行檢查，所以如果能在那裏盡早發現、跟進或轉介一些有問題的家庭是最好的。在衛生署、醫管局、教統局、社署和非政府機構的協助下，我們在數個地區試驗了這個計劃。這計劃在深水埗區開始推行，現已擴展至天水圍、屯門和將軍澳，最終希望能分階段在全港實施。

如果家庭遇到一些問題，如家庭暴力、虐兒等，我們都

有不同的專業部門提供服務，包括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婦女庇護中心、家庭危機支援中心、自殺危機處理中心，以及求助熱線等。除此以外，部門與部門之間、同工與不同專業人士之間的協調也很重要，故此，我們在中央和地區的層面亦設立了不同的工作小組和委員會，令大家的協作可以更為暢順。當然，我們亦不會忽略社工的培訓，因為他們在學院畢業後，其實還需要不斷學習。這幾年，我們培訓的重點都與家庭暴力有關，盡力令大家提高這方面的意識。

因時間關係，有關這幾年來新資源的投放方向，我就不說了。最後，我想作點總結，解決社會問題，提升家庭健康，必須從支援和強化家庭出發。我們的措施以家庭為本，著重加強家庭功能。這幾年，政府很注重預防教育，希望能及早介入和識別問題家庭，避免問題惡化。我們亦希望透過建立社區網絡和社區資本，推動鄰舍互助及家庭成員間的互相支持。我們不容許家庭暴力，亦會致力為受害人提供支援。最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提升家庭的健康，建立「家庭友善」的社會，是一項全民工程。社工當然有他們的角色，但也有他們的限制，因為社會的問題很複雜，是否可以成功化解一個問題，要看很多因素，如果單靠社工或某些服務，其實並不能全面解決問題，所以社區、鄰里、學校、商界、傳媒、宗教團體和非政府機構都要積極合作，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成員必須承擔他們的責任及義務。

（羅致光）

我很高興自己是第三位講者，因為可以不用再談前兩位講者已說過的東西。我會較少討論政策，因為剛才方敏生已談了很多。我會從認識家庭方面，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每次做完研究，或看完研究報告，我都會有同一個感覺：自己不知道的事，是多於自己已認識的事。我經常覺得，做完研究便等於開了一道門，未開門前甚麼也看不到，開門後，看到很多近的東西，但發覺有很多遠的東西還不能看到。我喜歡這種感覺，發覺這世界原來真的很大，有很多我們需要知道的東西。

進行家庭研究的過程中，最令人懊惱的問題是：究竟甚麼是家庭？家庭的定義是甚麼？記得在十多年前，在社聯舉辦的一個有關家庭的研討會中，我批評家計會和家福會的標誌，指兩者的會徽同樣都是兩個成人和兩個小朋友，上面加一個屋頂。兩個圖案都告訴我們，家庭就是這般模樣。當年小學一年班上學期課本第二課的內容還是「爸爸上班去，媽媽留在家中做家務……」以上種種都反映了當時家庭的含意。

究竟甚麼是「家庭」？數年前，我們為檢討和修訂領養條例進行諮詢時，有關家庭的討論開放了很多，但有一點還是未能被人們接受的，就是讓同性戀人士領養小朋友。兩位同性戀者同居，在香港不可稱為婚姻，那麼，他們又是否一個家庭呢？這個問題較難處理，因為背後有很多價值判斷的問題，使有關討論變得複雜。在剛才提過的社聯研討會上，我說其實我們不應再在各方面太刻意強調「完整家庭」，這四個字該從我們的字典中撇除。我說完便給人罵，還問我是否想破壞別人的家庭。我回答說並無此意，事實上有許多家庭都曾經分開或重組，如果堅持用「完整家庭」的概念，會產生很多問題。甚麼叫做「家庭」？是否一定要以血緣、婚姻為指標？我們必須考慮這些問題。將來我們討論家庭政策或家庭影響評估時，亦必須同時面對上述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涉及很多價值觀念。

另外，這次中大的研究主要是討論家庭健康。家庭健康這概念雖然很抽象，但跟我們常說的個人健康意思相近，故一般人亦能明白所指的是甚麼。可是，這概念本身包含的元素很複雜，而且有許多相關的概念，包括家庭的凝聚力、和諧、溝通、投入等。這些概念中有一個較特別的元素，與家庭健康有些關係，就是角色的協調。當我們觀察家庭變化時，經常要面對一個問題：有很多人說的跟做的很不同，這就是做研究的困難。譬如問一些父母，養兒防老是否重要，然後再問他們的子女同一問題，一般估計子女會比父母較不重視這個問題，但研究結果顯示的並非如此。究其原因，大概子女為了要符合社會規範，便回答願意供養父母；父母則為了降低期望，便說自己不會養兒防老。可是，這只是他們表達期望的方法，實際

上，他們是否會這樣想和做呢？我們不會知道，因為這純粹是一種價值的表達。那麼，當我們嘗試瞭解家庭健康時，應根據他們所說的，還是他們所做的去判斷呢？諸如社聯的「香港社會發展指數」等的指標，與及剛才馮伯欣列出的有關數字，全都稱為客觀指標，它們令我們覺得客觀的情況跟我們主觀訪問所得的印象有所差異。

另外是角色協調的問題。剛才中大的研究有一點跟這方面有關，就是有關兩性的一些有趣的現象。男性一般較女性樂觀，尤其在婚姻關係上。換句話說，男性的危機感較低，而女性則較缺乏安全感。因此，如果問及家庭健康，一般來說，男性的評估會較女性高。個人健康亦一樣，男性永遠自滿，認為自己很健康；而女性總覺得自己需要更努力保持健康，雖然她們未必會這樣做。這與家庭協調有何關係呢？去年，香港大學社會學系亦做了一個家庭研究，當中有趣的部分是關於一些價值和行為問題。我們發現，現在的人多談了一些所謂「開明價值」（liberal values），特別是男女平等，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實行。例如在家中誰會做家務如洗碗碟呢？剛才馮伯欣在演說中很少提到爸爸，通常只提及媽媽、婦女。如他介紹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時，只會想到婦女；講述幼兒照顧服務時，也只會想到媽媽。在我們所做的研究中，受訪者提出的價值都是正面的，如男女應該平等、家庭應該分工。但當問到誰負責家務時，一般的答案都是女性。當然，近年男性家庭工作者的數目增加了，但在比例上和女性仍然存有很大差距，這方面的負擔仍然落在女性身上。很多時候，在角色協調上，價值和行為的差異只是矛盾的一部分。在社會關係的範疇裏，我們一般較偏向對婦女的服務，男性的服務向來缺乏。其實男性缺乏別人理解，很需要社會支援。在一個關於家庭暴力的研究中，一個比較有趣的數字是，男性被打的數目，竟比女性稍高，雖然這差異未達統計上顯著的水平。實際上，在很多家庭問題上，男性在社會的發聲（articulation）和表達是微弱的。因此，我們需要考慮，在協調家庭角色時是否也應該處理男性在家庭角色方面的問題呢？

看過中大這個研究後，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看法。首先是有關家庭收入與家庭健康的問題，大家可以看看馬麗莊派發的資料，自我身心健康評估與不同家庭收入的 β 係數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反而與中學學歷卻是顯著的，但與大專或以上的學歷又不顯著，這明顯是因為樣本數目不足，而非關那 β 係數的問題。我做了這麼多年的家庭研究，心裏都會有這樣的疑問：究竟低收入家庭是否比較不快樂和不健康？在十多年前我所做的研究中，如果單看收入和其他家庭健康的指標，可以明顯地看出，低收入人士的數值是偏低的。可是，當同時控制其他變項，特別是教育程度時，收入和其他家庭指標的關係便會消失。這是教育的問題嗎？但為甚麼和教育有關？我只能作一個假設：這跟解決衝突的能力是相關的。我計劃來年進行一個研究，重複1993年的研究，希望屆時能探明這究竟純粹是一個解決衝突的問題，抑或是教育的問題。如是教育問題的話，是甚麼的教育問題？為何會跟家庭健康扯上關係？因為「教育」二字實在太空泛了，在制訂政策或提供服務上幫不了忙。大家都知道多些教育當然好，但若要針對家庭問題的話，這部分必須再深入研究。

除此之外，我還想談談有關家庭相聚和分享時間的問題，並希望中大的有關研究人員能就此詳細分析。我懷疑當控制了家庭規模這個變項後，家庭相聚時間和收入的關係便可能大部分消失了；若再控制多一個變數，即居住的區域，家庭相聚時間甚至可能會和收入完全無關。有這個假設，第一個原因是住在偏遠地區的家庭，收入亦會偏低，黃大仙區、深水埗區和觀塘區除外，但如果就人數和其他種種因素計算，低收入跟住在偏遠地方可能相關。偏遠地區人士的交通時間較長，導致家人相聚時間較少。第二個原因是家庭規模的問題，因為家庭人數多少跟家庭收入有關。當問及受訪者是否經常跟家人吃晚飯時，一般不會問受訪者是否經常跟全部家人吃晚飯。那麼，受訪者的家人愈多，跟其中某些家人經常吃飯的機會便愈高，而跟所有家人吃飯的機會則愈低。因此，如何得到和理解家庭團聚的資料是一重要問題。有許多社會問題跟我們的城市設計關

係很大，家庭問題亦然，例如昔日養情婦的重災區是屯門，今天則在水圍，大家可以看到偏遠地區的家庭問題相當嚴重。現在，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一個地區的工作職位數量明顯地影響其失業率。以前有些人會對此質疑，因為香港是彈丸之地，交通方便。雖然香港交通方便，但以黃大仙為例，失業率偏高，是18區的首三名之一，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在黃大仙區，每一名工作人口只有0.39份工作，比水圍稍高，但在深水埗區，失業率偏低，僅比全港的失業率稍高，因為平均每一個人就有一份工作。偏遠地區如元朗區平均一人只有0.34份工作，如把水圍計算在內的話，數字會更低。由此可見，偏遠地區的市民需要離開本區出外工作，但有很多人會受到交通的限制而造成失業問題，特別是婦女，因此一個地區的工作職位數量是否足夠是十分重要的。現在的城市規劃還未能大膽改善這現象，長此下去，這個問題會延續下去，直到永遠。假如我們未能具體解決偏遠地區的工作問題，家庭、失業、貧窮等問題都會繼續存在。剛才論壇未正式開始前，馬麗莊問我是否贊成把政府總部搬到水圍，我說即使不是政府總部，還有許多政府的主要部門並非為一區服務，可以從油尖旺區搬到水圍去。偏遠地區的交通問題對家庭的影響相當大，嚴重影響該區家庭的相聚時間。

其他方面，我在這裏不多說了，只想大家再思考一個問題。我用一個例子說明：一個人因為家庭關係不好，導致他在公司與同事發生爭執；又有人在工作時遇到不開心的事，回家便跟家人吵架。從研究角度看，我們會發現他的精神健康欠佳，但很難分辨這是由家庭健康，還是由工作健康所影響。因此我們從社會政策角度去觀察這些問題時，必須知道有些時候我們不能個別獨立研究各種因素，應全面探討所有政策，因為不同的政策都可能影響個人或家庭健康。

(林陳蘭德)

在我回應中大研究得出的數據和結論之前，我想給大家說個故事。今年的聖誕和新年假期後，我回到辦公室上班，同

事很緊張地對我說：「林教授，你知不知道某某人上星期剛發覺自己患了腸癌，他今天下午2時就會動手術。」聽了這話，我不禁嚇呆了，因為我與這位同事，不只感情要好，大家有共同興趣，而且他還是一個很注重生活健康，經常無私地關心別人的人，所以我一直不覺得在短期內他會有甚麼健康問題。我當時十分震驚和難過。禍不單行，當我打開電郵，在那幾十、甚至上百的電郵堆中，又看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我和丈夫的一個好朋友，在電郵中告訴我他患了腸癌，恰巧和我的同事於同一天但在不同醫院動手術。當時我便覺得，兩件事是否純屬巧合。他們的心情如何？他們如何去面對？他們的家人會怎樣？因為那時正在過節，他們的親朋戚友可能未必在香港，亦可能時間不便不能給予他們太多支持的。當時想到的還有一個人身體和精神健康等一大堆東西，和平常讀書時提到的力量（strength）、抗逆力（resilience）等等概念。我的同事做了一個很長的手術，差不多六、七個小時，在七天後出院。這位同事50多歲，和我那位患了腸癌的朋友差不多年紀，兩位也是男性，不同的是，我的同事結了婚，沒有小朋友，他的太太很支持他、關心他，大家志趣相投，故此，精神上的支持沒有問題，康復的速度非常快；另外那位朋友則離了婚，子女已經長大成人，並在外國生活，當知道父親有病時，都第一時間回來香港輪流照顧和支持父親。這位朋友亦在一個星期內出院，不過他不像我的同事幸運，需要接受化療，起碼要請假半年。

我說了這兩個事例，目的是要說明身體不適等事情，是我們經常需要面對的，若它變成危機，那便要看當事人如何面對，周遭的人可以給予他甚麼支持，令他可以重新站起來。這個過程的快慢程度，在不同情況下會有不同。

中大的研究顯示，身體健康與精神健康有很大的關連，僅次於家人不和，家人或自己有病是第二個最多人遇到的不如意事件。中大的研究指出，家庭的抗逆力及處理壓力的方法，反映了家庭凝聚力的強弱。我那兩位同事和朋友的家庭結構並不一樣，一個是完整家庭，但沒有子女，另一個是離婚家庭，有子女但不同住。因為他們平日的精神健康都很好，加上親友

在危機出現時能給予適當的支援，所以都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康復。同事還跟我們說笑，說如果將來星期六、日行山或有甚麼活動，一定要約他；另外那位朋友想起每個月的例行飯局，也叫我們提醒他參加。兩人的恢復能力都很強。

家庭的抗逆力與家人能否互相支持有很大的關係，我想從相反角度看，討論家人不和這個問題。家人不和多因婚姻關係或親子關係發生問題而產生。我在工餘時會做一些家事調解的工作，故以一個個案為例。這個案中夫妻不和，甚至到了要離婚的地步，離婚的主要原因是那位男士有婚外情。夫妻兩人都是非常高收入的人士，但擁有的社會資本極少，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參加一些民間社會組織或活動，以致兩人的支持網絡都十分薄弱。與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我看到妻子除了工作和照顧子女外，應付危機的能力非常有限，可說束手無策，更談不上幫助孩子處理心理或精神的困擾。我提及這事例，是想指出：家庭健康不只關乎家庭成員的身體健康，還包括精神、心理和情緒的健康。

西方社會有很多關於家庭健康的研究文獻，好像剛剛談及的抗逆力、力量等文章也不少。我嘗試尋找一些華人學者的文獻，找到了一些：這些學者利用醫學模型為取向，研究有關家庭健康的課題。他們把健康和正常等同，說健康家庭等於正常家庭，正常家庭就一定健康，或把沒有失去功能的家庭叫做健康家庭，又或將落入常態分布中間部分的家庭稱為健康家庭，落在兩端的就是病態家庭。我認為健康不應只看結果，還該看過程。不同的家庭健康基礎起點各異，健康程度也有不同，並且受到每個家庭成員特性的影響，以致每個家庭達到家庭健康的目標的快慢速度亦有分別。我嘗試找一些關於家庭健康指標的文獻，發現一些台灣學者訂立了一些指標，比如藍采風說健康家庭有12個特質，包括難忘的童年、共享的歷史、難忘的記憶等。我又找到另一份文獻，由郭筱雯撰寫，她把健康家庭的特質歸納為16點，當中一些和藍采風重複，但郭筱雯較注意溝通，即家庭成員有沒有機會見面、有沒有機會瞭解等。

從這兩位台灣學者的研究心得，加上我對中大這次研究的觀察，有幾點可以和大家討論。

首先，家庭健康和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成正比。中大的研究發現有一成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內的身體和心理健康屬差或非常差。如果要促進家庭健康，最重要的是注重每個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家庭由不同的家庭成員組成，每個人的健康都十分重要。我嘗試找資料時，發現一個「從絕境到開心」的語錄，大家看看有沒有做這些事呢？如每天大笑一次？減少一半看電視的時間？看電視是一個利用時間的被動方法，和家人在家中坐在一起看電視，完全沒有交流，那如何促進家庭的健康和快樂呢？

華人家庭比較注重和諧，和諧令家庭的快樂增多。2006年7月，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發表了一個世界快樂地圖報告（The World Map of Happiness），從四個環節搜集資料和分析世界各地人民生活的快樂程度。這四個環節包括人民生活的滿足指數、人均壽命、國民生產總值和教育程度。你猜香港在全球178個地區中，快樂指數名列第幾呢？在178個地區中，香港名列63，是亞洲第三個樂土。這當然有很多爭議，因大家對快樂的準則未必和這個報告所訂的一樣，但香港如要維持亞洲第三樂土的排名，大家便要加把勁，因為中大的研究發現，香港較低收入家庭的家人相聚和分享時間較少，容易令家庭關係疏離，遇上危機時家庭的凝聚力因而不足，影響家庭的抗逆能力。

此外，中大的研究又發現，受訪者不容易向家人表達個人的擔憂及感受，這顯示中國人喜歡將不好的東西收藏，「家醜不出外傳」這個觀念仍然根深柢固。我們不輕易將負面感受與家人分擔，可能是怕他們擔心，但更壞的是，連開心的事情也不會和家人分享。所以，我建議：第一，應該由小時候開始培養溝通技巧，最好由幼兒教育做起；第二，該有多些機會在不同場合討論兩性性別觀念的定型，讓大家瞭解男子漢也不是「有淚不輕彈」，因為人非草木，每個人也有感受，所以不論男女也好，都可以開放自己，表達自己的感受；第三，不

要把負面情緒累積起來，要適當地運用時間和技巧去處理，例如離婚和再婚的夫婦，應該疏導自己的負面感受，才可以幫助子女去紓解家庭破裂和家庭關係改變的困擾。親子和婚姻關係出現問題，甚至虐待配偶等行為都源於負面感受積壓，大家住在同一屋簷下，也不能開心見誠地把問題提出來解決，問題就會不斷惡化。

從宏觀的層面看，家庭健康不容忽視。一些機構實行五天工作，僱主把每天的工時加長，使下班的時間晚了，如果家中有年紀較小的孩子，父母根本沒有時間和子女溝通，更不要說有甚麼管教。沒有足夠的溝通時間，會影響家庭的凝聚力。有些家長根本沒有時間督導小朋友做功課，令小朋友的成長缺乏父母的指導和教養。

中大的研究也提出了社會資本和居住環境對家庭健康的影響，若再跟進研究，可以加入如空氣污染、噪音、全球暖化等問題對人們的影響，這些都是家庭健康很重要的指標。

總括來說，要促進家庭健康，應首先提升個人健康和抗逆能力，使那些面對社會急遽變化的家庭，保持家庭和諧和凝聚力，即使面對困難和危機，仍能靠相互的溝通來接受挑戰。促進家庭健康的目標，需要政府提供足夠的資源，讓教育、醫療和各個界別的專業人士合力攜手才能達成。

台下討論

（台下嘉賓）

我很認同中大研究的結果，家庭健康確實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我也很認同方敏生所說的最高工時問題，每個人都很關心自身的健康情況，以至整個家庭的健康。可是，經歷了數年的經濟不景後，香港人的工時真的變得很長，即使政府帶頭五天工作，但可以跟隨的機構又有多少？無論是大眾，或是自己行業的同事的工時真的很長。剛才才有講者提及我們能否有多些時間和家人相處，和家人談天，少些看電視時，我已經

在想，我有多久沒有看電視呢？故此，對整體香港市民的身心健康來說，訂定最高工時是非常重要的。

「家庭友善」措施真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希望馮伯欣可以好好考慮。政府在這方面可否用立法的方式處理，或推出一些措施，以鼓勵多些機構在工作環境中落實「家庭友善」措施。當然，我知道政府已不斷呼籲公眾，特別是一些私人機構，自行訂定最高工時，或推行多些「家庭友善」的措施，但鼓勵歸鼓勵，政府如能以稅務配套，促使公眾推行這些政策，相信更多私人機構會願意這樣做。此外，對一些大機構來說，推動「家庭友善」措施可能比較容易，但對於一些小型機構來說，則可能有困難了。在一些低收入家庭，家人的相處時間或家庭凝聚力都十分不足。一些低下階層人士十分緊張他們的飯碗，一些婦女甚至有數份兼職，希望能幫補家計，他們又何來條件爭取和家人多些相處的時間呢？對於低收入家庭中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士，我們應否為他們訂立最高工時呢？若能實行的話，我相信對全體市民來說都是好事。

此外，隨著香港人口結構轉變，單身人士愈來愈多。既然愈來愈多獨居家庭，政府有沒有考慮可以為他們提供甚麼配套服務？這事必須要未雨綢繆。

（羅致光）

我想補充一點，當然，我想爭取最高工時，或者叫作標準工時，這值得社會討論和爭取。不過，作為社工，我認為相聚時間（time together）或家人相聚時的質素，即家庭生活的質素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應要改善家人相聚時的質素，看少些電視是其中一個方法。不過坦白說，有些家庭就是不看電視，也不會交談；也有些家庭，如果開了電視，家人唯一可以談論的便是電視劇的劇情。究竟我們要怎麼去協助家庭，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家人相處時，可以做些甚麼？這是文化工作的問題。在資訊社會中，我們太依賴電子傳媒提供信息，漸漸電子媒介取代了很多以往家庭的互動活動。現在一般有多少家庭會進行其他活動？搓麻將也可能湊不夠人數，因為一個家庭平均

只得3.1人。除了搓麻將外，其實一家人還可以有很多其他活動，但現在都已經完全被外界的東西取代。怎樣去改變家庭裏的活動，使家人的互動變得有質素，是很長遠的工作，也很值得去想。

(劉玉琮)

我想回應剛才那位同工。我用羅致光的說法，即「甚麼是家庭」那個概念來回答。其實剛才談及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香港的家庭形式愈來愈多元化所導致，現時的家庭形式與以往主流的「同一屋簷下」，即齊齊整整一個家的形式其實很不同。而方敏生提到的家庭影響評估(Family Impact Assessment)我亦很贊成，但是「family」這個字就不可以用單數，應該用「families」，即很多種不同的家庭。我們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應留意政策對不同形式家庭的影響。

(王家英)

我不是社工出身的，但聽了這麼多，也有一些想法。大家好像嘗試找一個單一方法來解決複雜的家庭問題，有些人針對低收入，有些人談偏遠地區，有些人說工時過長，其實我們有沒有辦法構思一個複合方案呢？家庭也好人也好，都是活在一個生活處境內。生活處境各有不同，當你說他工時過長時，他未必是低收入；當他低收入時，又未必同時工時過長，故可能要找一個複合的模型才能解決問題。當然，某一類型既是工時過長，又是低收入；但剛才林博士就提到一個工時過長，但超高收入的例子。所以，我們處理一些複雜的人生處境問題時，應該針對的其實是每一個人，或每一個不同類型的家庭處境，才能提供比較有效的服務措施。當某一特別類型家庭面對家庭危機的時候，你必須針對它特別的社會或生活處境，才能提供有效的服務，而不是說，只因為你低收入，我就給你這一大堆東西，這樣，你給他的可能有99%都不合用，只得1%合用。問題的關鍵是怎樣去建立一個生活處境的分類模型(typology)。若你低收入，又高工時，再加上你是羅致光所

說的一些偏遠地區居民，問題出現時那種爆炸性就更大，故此，我們應該因應不同的生活處境或條件，建立不同的分類模型。每一個模型都能針對性地提供比較適合該類家庭的服務。某些家庭的家長有很多空閒時間，可能你不用教，他們也懂得跟子女溝通。某些家庭的家長完全沒有時間又低收入的，可能無論你怎樣推動他，他也不能騰出更多時間來作溝通，你如何去面對這種情況呢？我們可以嘗試結合宏觀和微觀的思考，去建立一些比較複雜的生活處境分類模型，然後因應這些模型不同的特性，提出一些針對性的服務，這可能會比只透過一兩個單一政策來解決所有問題，更加具體和切合需要。

(馮伯欣)

我也贊成不可單一化地去看問題，因為問題的嚴重程度有所不同，這牽涉到我們怎樣去評估工作的服務對象。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在處理輔導個案時，也需要填寫一份評估表，當中列舉了多項問題，由工作人員在接見服務對象後別寫，若超過了某個分數，這便可能屬於危機個案，警覺性就要高些。我們亦嘗試在一些家庭問題如家庭暴力，發展多些深入的評估研究工具，但發覺並不容易，因為一方面那張評估表會很複雜，另一方面那些資料也不知應由誰提供。由當事人提供？還是由個案社工提供？從不同角度，填表時可能也有不同；何況，有些時候連最關鍵的人物也沒有出現。我們會繼續嘗試發展這些評估工具，但只可作為參考。我知道學院的社工訓練很重視工作人員的專業評估，個案評估難在不易將它拆開，用一個分數去量度，須經社工與服務對象會面後，才能下整體判斷。

(王家英)

我並非說要訂立一個家庭問題危機指數，我只是說，由於我們的社經背景不一樣，一個低下層、高工時、高工作量的人和一個中上層、高工時、高工作量的人所面對的生活處境或家庭處境可能很不一樣，但如果你只用一個單一概念，即工時過長來處理，他們的家庭危機就變得相同，那麼，在解決有關危

機時就會遇到很多困難。我們一定要針對家庭的社經背景，或家庭成員的構成，去構思複合的模型，而不是因為收入相同，就當作處境也一樣。低收入家庭也有不同的、錯縱複雜的家庭關係、社區關係等，需求的服務可能也不一樣。如果我們只是以單一概念去思考問題，例如你住得偏遠，我就劃一地給你某些服務，你得到的服務和你的實際需要可能並不一樣，那根本不能解決問題。

(方敏生)

王家英說的是，一個多元化社會問題複雜，每個人、每個家庭的情況也不相同。我的看法是，尊重家庭本身的選擇之餘，也要顧及兩個底線：第一，那些最弱勢的家庭，是否真的有選擇？例如一個在網上銀行（I-banking）工作的人，如果成功，搏殺幾年便可以退休，那時可以再補救，天天照顧子女；但對於那個既要撫養子女，還要每天工作12小時的單親家長來說，他有沒有選擇？故此要有一個政策去保護社會最底層的人。我們對大環境似乎已經束手無策，現在是流行不婚不育的年代。以我在加拿大生活的妹妹為例，她丈夫是牙醫，一星期只工作四天，四個小朋友都在家學習（home school），她可以這樣選擇，是因為整個社會有條件讓她實行。政府需要訂定遊戲規則，保障最低下階層有最起碼的家庭相處時間。第二，除了保障能力最弱的那些人外，也不應遷就個人的選擇，否則社會是要付出代價的，例如最近一個母親把一歲和兩歲的兒子困在家的木門與鐵閘間，跑到深圳去玩，她的選擇對兩個小朋友的成長實在有很大的影響。這種社會成本是需要整個社會來付的，我們容許家庭自決，容許家庭有發揮的空間，但也要為此訂立最低的底線。

(王家英)

我完全沒有意思否定宏觀政策，宏觀政策可以作出不同調整，例如工時過長便可以把它訂得比較適中，薪金太低便可

以畫一條最低工資線。我的意思是，當制訂了縱橫交錯的政策條件時，仍然會出現不同的政策與政策之間的互相影響，或條件與條件之間的互相影響，不能只根據一個政策條件去處理所有事情，宏觀政策和具體服務的推行需要交互配合，才可收到最好的效果。所以，當我們設計一些服務的時候，不應只從宏觀角度思考，還要顧及微觀個案需要，針對不同家庭的特殊生活經驗、生活處境，推出不同的家庭服務。不能因為你是低收入家庭，我就給你某種服務，可能這種服務對你根本不合適。剛才林陳蘭德說到，超長工時的情況不單在一些低收入家庭存在，如果你把超長工時問題齊一處理，便不能對症下藥。

（羅致光）

以不同方法處理不同情況或事情，這個說法永遠是對的。多些時間留在家中並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多些時間陪伴家人，家庭健康就好，那樣失業人士的家庭健康豈不是最好？我們分析任何政策，都可以使用矩陣（matrix）的方法，例如研究家庭時，便要列出各種不同類型的家庭，各種不同類型家庭的不同需要，各種可用的社會措施，各種措施的不足之處等。剛才有關最高工時的討論，大家一定不可以抽空來看，最高工時一定要與最低工資一起推行。沒有一個國家單有標準工時但沒有最低工資的，因為你不可以只限制人民不能超時工作，讓他們餓死也罷，人民賺不夠錢生活，還是要工作的。沒有最低工資保障，卻又限定不可超時工作，是不可行的，所以，高收入人士通常不設標準工時，他喜歡從早到晚工作也沒問題，但作為一個社會政策，不能抽空去看最高工時，必須配合最低工資。

（林陳蘭德）

政府須提供不同服務以滿足不同家庭的需要，也要讓家庭自行選擇，例如一些人有很多時間和金錢，但未必一定喜歡常常和家人一起，故此應讓他們選擇。此外，我們是否應該要檢視香港人的家庭價值觀？他們的理想家庭是甚麼類型？以甚麼

信念系統 (belief system) 去引導他們的家庭行為？我們理想的家庭形式又是怎樣？和家人的關係以怎樣的形態出現才比較理想？這都要透過辯論才能有一個目標性的方向。

(陳秀嫻)

要宣傳家庭健康或家庭生活質素，便要加設倫理價值或宗教教育。為甚麼我提出這點？一個人要與疾病抗爭或面對危機的時候，對生命的積極看法可以加強他的生存能力，所以我覺得宗教或倫理教育可以對家庭健康有很大幫助。每個家庭都會面對一些危機，如果要提升家庭生活質素，便需要推行宗教或倫理教育。香港老年學會也提過，長壽的十大條件之一就是使生命活得更有意義。

(馮伯欣)

我想再回應一下王家英的提問，剛才的回應好像中斷了。我十分同意服務提供不能單一化，要看對象的需要。一個人可以有許多不同的需要，故此在設計服務時，也要提供很多不同的種類，以滿足不同的需要。至於如何配合，這便十分依賴社工的評估。當然，現有服務也不是單一化，例如照顧兒童，有日間中心，也有全日監護，更有些可能要強迫照顧 (forced care)，這要因應不同小朋友的需要來訂定不同的服務。我們會留意有沒有服務空隙 (service gap)，如果有的話，我們要如何彌補？如果缺乏某些服務，但服務對象本身或其家庭擁有相關資源，可能不需要透過政府提供服務，例如家人或親屬能夠幫忙，又或者他有方法去解決問題，這長遠來說是更好的，是我們最希望看到的。

(雷張慎佳)

我在工作中常遇到一些可以說是不太健康、有問題的家庭，所以當我知道你們舉辦這個論壇時，便想來聽聽，瞭解究竟香港華人家庭健康有甚麼問題，如何可以令家庭更健康。我十分同意剛才羅致光所說，做研究好像是開了一道門，讓我們

可以看到新的景象，中大的研究正是這樣。不過，老實說，我們還需要更多時間去仔細分析調查數據，現時的結果可能比較表面化，甚或出現矛盾。

剛才馬麗莊和馮伯欣對這個研究作簡單的總結，都指出香港華人的家庭健康情況似乎不錯，我不斷的想，這是否反映了實際的情況？我們每天從報章和不同的社福機構看到的個案，有否在研究中得到反映？我十分同意剛才王家英所說，這其實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這個研究雖然訪問了千多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可能需要作更仔細的分析。那些收入較高的家庭，家庭功能雖然好些，但他們同樣也會面對很多的壓力和問題，此情況又到底可否在這研究中反映出來呢？

剛才提到個人健康可影響家庭健康，相反來看，家庭健康是否亦會影響個人健康？兩者怎樣平衡？中國人以往很重視家庭，為了家庭健康的需要，可放棄自己的利益。究竟華人家庭特質與西方家庭有沒有分別？今天沒有太多這方面的討論。西方不少一人家庭，小朋友比較年幼就需要出外工作或自己生活，對西方社會來說，這是健康的，是他們的基準；但回看華人社會，以我自己為例，若有家庭聚會，我的兒子說他有約會不來，那可否說我的家庭不健康呢？同樣道理，是否離婚率較高，就是不健康家庭的比例較高呢？一些有暴力問題的家庭如果勉強維持婚姻，就可能會有人被打死，這是非常痛苦的抉擇，如何平衡呢？

（何文康）

家庭有沒有所謂權利，即family rights呢？要爭取家庭權利是比較困難的，因為社會一般都只重視個體，著重爭取如女性，甚至男性的權益。然而，社會既應探討家庭權利的底線，也需要對家庭價值有一份尊重。一個人若是工作狂，要行使權利，喜歡不斷工作，我們也拿他沒法，但希望他亦能尊重家庭的價值。我們在一些研究中，找到一些有關家庭健康的指標，於是確立了不同的家庭權利，以保障家庭健康，並且訂定了家

庭影響評估，以鞏固我們進行有關家庭的工作或強化家庭工作的基礎。這是我第一點的反省。

第二點是我們都很著重婚姻，並經常希望推動家庭核心價值。家庭的基石是婚姻，因此婚姻健康也應該是家庭健康的一種。香港有很多家長都需要工作，但每當我們舉辦親子活動，很多時候名額都會爆滿，可見親子健康亦是家庭健康的一面。說回婚姻健康，我們經常考慮，應如何探討婚姻作為家庭健康這一理念，可以利用甚麼指標探討。家庭的穩定性和凝聚力與婚姻是不可分割的，兩者的關係值得我們探討。但在政策方面，討論時必定會引起很多爭議，因為當我們提及婚姻，會出現不同價值觀和相關的傳統觀念。政府對婚姻沒有固定政策，一向保持中立。大家都認為婚姻是私事，殖民地政府也尊重婚姻私隱權。然而，我同意剛才雷張慎佳的說法，有時候我們做一個個人決定，例如離婚或申請法援，可能會產生社會影響，因此，如何研究婚姻健康亦是很值得討論的題目。

第三點是當我們討論家庭時，福利界會關心到暴力和虐兒的問題，這都是從一般的病理學（formal pathology）角度出發。如果利用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是否應該有正向的家庭心理課題？這就正如從病態的角度觀察個人問題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從性格與品德的角度，探討如何借助個人性格或優點去面對逆境。在研究家庭健康方面，很高興看到台灣研究家庭健康特質時，不僅提倡零暴力，而且還研究一些正向的家庭特質和性格。外國很多院校都有家庭研究，不單提供治療，而是在政策的層面、性別研究、生活學、社會學等方面，都有學系進行相關研究。在香港，相關的研究卻十分缺乏和零碎。事實上，政府和院校把資源投放在這方面是十分值得的。最後，這課題最備受爭議的問題是「甚麼是家庭？」，外國亦有就此作許多討論，爭議是不能避免的。大家都必須承認多元的現象，但有一點必須考慮，當所有東西都被接納為家庭時，便會打亂家庭的概念，變成家庭甚麼都不是。因此我要問，究竟底線在哪裏？現在是沒有答案的，還需要大家繼續討論和研究。

(林陳蘭德)

我想回應何文康的意見。我的老師曾經教我一個概念：「這個家庭發生問題」，而非「這是一個問題家庭」，兩者的分別很重要。家庭是否健康是一個過程，它可能在某個時期陷入困境，但克服困難後便會回復健康，甚至比之前更健康。因此何文康所說的離婚家庭、再婚家庭、重組家庭等，都有我們值得在其中學習的地方，也帶給我們很多正面訊息。研究顯示，如果同住的小朋友看到父母經常吵架，甚至打架，對他們造成的身心傷害遠超過父母離婚的影響。家庭遇到困難，如果能克服的話，可以邁向更健康的方向。這成長過程都值得我們去探索和肯定。

(劉玉琮)

我最近協助一些機構進行工作-家庭 (work-family) 的衝突如何影響家庭生活的調查。透過翻閱文獻，加上自己作為職業女性的經驗，得出一種看法。在這方面我只談女性，因不太熟悉男性的情況。在香港，一個職業婦女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呢？她們會努力工作，亦會努力照顧家庭，還會盡量抽空教導子女做功課，充分做好媽媽的角色。不論是去年明愛進行的研究，還是其他相關的研究，都不斷重複告訴我們這一點。有數據顯示，有部分在職母親每天只有四至六小時的睡眠時間，她們早上六時便起床送子女上學，是為了要多接觸子女，擔任母親的角色。香港人十分拼搏，以女性的經驗來說，一個全職的職業婦女仍然是以家庭為重，但又不會放輕工作，最後犧牲的是自己的精神健康和休息時間。如果就個人健康與家庭健康來說，我最憂慮的是個人健康。當個人健康欠佳，個人支持不住，便會引發家庭衝突，從而影響家庭健康，這是最憂慮的。

(台下嘉賓)

我從事長者社會服務工作，今天在這裏聽到討論家庭的定義時，都比較少提到長者。最近討論的家庭暴力條例竟然不包

括長者，真使人遺憾，現時一般的家庭定義只涉及夫妻、子女等，容易忽略了上一代。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我最近進行了一個有關年長男士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家庭成員竟然不會分擔憂傷的事，相對地男性更避談憂傷話題。中年男士在一般家庭的主要角色是賺錢，賺錢以外，便沒有其他家庭角色，很少會與家人溝通。然而，如果未能在此階段做好家庭溝通，在老年時便容易出現問題。我從事長者工作，發現女性愈年長就愈快樂，而男性則相反。年長的男士面對著獨居、抑鬱等問題，你會發現他們全都只會呆坐公園，不會尋求我們的協助。這正好反映他們完全未能適應沒有工作後，需要從工作角色跳到其他感情、家庭角色的情況。在家庭健康方面，男性作為一重要角色，卻不能面對因退休帶來的家庭各方面生活的轉變，導致年老的男士出現適應問題。我希望未來的政策可以處理這些問題。

(馬麗莊)

在這論壇完結前，我想綜合今天的討論。我們的研究小組成員在討論這個問卷調查時，爭辯得最多的是羅致光一開始提到的家庭定義。我們反覆討論了多次，亦感到很苦惱，因為電話調查始終有一定的局限，跟上門訪問相差甚遠。我和劉玉琮曾經與台灣中央研究院合作做了一個有關的比較研究，於是便提議利用一個主觀的定義。但發覺並不可行，因為主觀定義亦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帶。因此我們認為「甚麼是家庭」這問題，無論在家庭需要、家庭困難或家庭健康的研究中，都是首先要解決的。希望透過在座各位的專業研究經驗，可幫助我們解決這一問題。

此外，我想從較宏觀的角度來結束今天的論壇。這個論壇的主要著眼點在香港，當中出現的家庭狀況和社會文化的轉變，對社會福利界，甚至整個社會來說，都是一種困難和挑戰。當然這轉變亦同時是一個契機。有數個不同的文獻都出現以下的結論：在已發展國家或城市裏，離婚、不生育、生育率低以至人口老化等問題日益嚴重。香港跟這類國家或城市的情

況類同。因此很感謝剛才最後發言人士的意見，提醒我們長者的需要也是不容忽視的。我最近參與了一個研討會，發現日本人在晚年離婚的情況十分嚴重，原因是日本女士認為男士在退休後，「變得十分麻煩」。這意味著在人口老化的轉變中，福利界和整個社會要面對和處理的事情很多，不是我們這個小小研究可以完全探討。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論壇只是2007年在有關問題上的首次對話，其他大學或研究機構都可就著這個題目繼續討論，謝謝各位。

注釋

1. 有關調查的詳細數據，可參閱馬麗莊、王家英、劉玉琮、盤淑嫻。2007。《家庭健康和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附錄：參加者名單*

主持：	馬麗莊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主禮嘉賓：	李少南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講者：	方敏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按筆劃序)	林陳蘭德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馬麗莊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馮伯欣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服務）
	羅致光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嘉賓：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按筆劃序)	何文康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總幹事
	吳燕玲	香港樹仁大學社工系講師
	周潔玲	香港樹仁大學社工系高級講師
	林茱莉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總幹事
	陳秀嫻	香港樹仁大學社工系系主任
	雷張慎佳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
	劉玉琮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盤淑嫻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家庭及小組實務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
	鄧廣良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

* 尚有其他出席嘉賓，未能盡錄。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Yeung Yue-man, PhD(*Chic.*),
Research Professor

Associate Director: Sung Yun-wing, PhD(*Min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